



老友李迪离开我们快一年了。

在追悼他的纪念会上，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李迪可以称得上是“感情一堆，血肉一堆”，这八个字是当年我在看《革命烈士诗抄》时，在何叔衡烈士的诗注中毛泽东对他这个老同学、中共一大代表的评价。边疆10年是李迪文化品格形成的重要阶段，最后的10年则是他历尽风雨、绽放生命的沉淀过程，这是生活馈赠他的“大礼包”。“热情、真实、快乐、认真”，这是我对老战友、老朋友李迪为人文的整体概括。

李迪的去世留给文学界巨大的遗憾和强烈的震撼，他是中国伟大的扶贫工作竭尽心血的一位作家，他在生命最后的阶段写出了十八洞村的故事。关于李迪，《文艺报》和其他媒体有过很多报道，当时向我约稿的媒体我都这样回答：“我一直不相信李迪离开了我们，所以这个悼念文章我写不出来。”但是，一年快要过去了，庚子年也走了，生活已经沉淀下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这篇《诗念李迪》的文章可以动笔了。

为什么说是“诗念”，而不是“思念”？因为我和李迪的相识是因诗而起，我们最后的结束留在微信上的也是诗。当年在昆明军区的基层创作队伍中，我和杨浪写诗歌，李迪和谢丽华写小说，我们几个来自北京的学生兵时常被昆明军区文化部召集在潘家湾第三招待所进行业余创作，我们的相识就始于那个简陋的部队招待所，那时候我们年轻、稚嫩，每次的欢聚都是用北京话诉说着各自的体会，诉说着自己的军旅生活，以及军旅趣事。我们那时候的相识应该是诗与小说的相识，我记得就是在那“三招”相聚的日子里，李迪得了个绰号“汤王”，因为他的饭量很大，胃口极佳，每次吃完饭桌子上的残汤一律被他一扫而尽。云南最有名的过桥米线，实际上是一只巨大的碗所盛的鸡汤，然后泡上线米，我和朋友们没有任何人能在最后把过桥米线全部吃完喝光，但只有一个人除外，那自然是李迪。也就是在昆明军区的第三招待所，李迪悄悄告诉我们：“彭荆风也住在这里。”那个时候昆明军区的老作家彭荆风还没有落实政策，他正等待解放，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芦笙恋歌》的作者曾这么近距离地和我们住在一起。

认识李迪没有多久，1978年我们各自脱下军装回到了北京。我直接到了《文艺报》，李迪则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朝内大街166号。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各自的选择，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会议上，我作为记者参加会议，无意中见到李迪。那次相逢是意外，更是快乐，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没想到这一握就是半个世纪。

我当时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文化部宿舍，是朝内大街203号，而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朝内大街166号，我们仅隔一条马路，所以我可以非常方便地到李迪当时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儿编辑室，去找他聊天、谈心，而我的儿童文学写作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了未来漫长的写作道路。当时李迪是《朝花》的编辑，这本大型儿童文学刊物现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由几个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当编辑，比如崔嵬、赵惠中，李迪也是其中一个，还有后来在民研会工作的贺嘉以及另外两位同志。由于李迪和我特殊的关系，他开始鼓励我写作儿童诗，他约稿的第一首诗是选入《1949—1979儿童文学诗选》的《小弟弟要画热带鱼》，我记得这本诗选的主编是袁鹰和邵燕祥先生。由于有了版面，再加上李迪的鼓励，我的儿童诗创作开始像喷泉一样涌动起来，发了一组又一组，大多在《朝花》上。我的第一本诗集叫《吃石头的鳄鱼》，责任编辑就是李迪，出版的时间是1983年，尾花是李迪的爱人、画家魏桂兰画的。第一版印了将近8000册，定价三毛八分钱，这本诗集鼓励了我在儿童诗写作道路上一直地走下去、走下去，走到今天。我记得这本诗集里边收录了一首小诗叫《南方的云》，副标题是《给南南》，诗是这样的：

你是一朵云，一朵南方的云，
碧绿的滇池是你的母亲；
你是一棵树，一棵北方的树，
在燕山脚下扎下了深根。

不，你就是你，南南——
一个活泼纯真的小灵魂！
你用诗一样的呐喊，
宣告了新一代的自信。

你用一头柔软的脸发，
轻轻抚摸着长辈们的心。
蒙眬的眸子像座水库，
贮满了天真和信任。

岂止是父母心血的孕育，
你本是大自然的一件珍品。
为加工每个能思维的细胞，
她耗去了亿万年的光阴！

所以，我愿意歌唱人的生命，
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诗念李迪

□高洪波

正是为了报答祖国和大地，
养育滋润我成长的深恩。

以上只是诗的第一节。这首诗写于1980年3月，是李迪的儿子李南满月的时候，这里边嵌入了李迪的两本书名，一本是《这里是恐怖的森林》，一本是《遥远的槟榔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没有成为父亲，又过了八九个月，我的女儿丫丫诞生，她和南南这一对小生命加上杨浪年龄相仿的女儿杨吟，如今转眼间他们已经是40岁左右的人了。孩子们的父母是三对滇军夫妻，所以我们经常举家聚会，形成一个特别特殊而温馨的两代人的聚会，而李迪的爱人魏桂兰曾是他小说《遥远的槟榔寨》的美术编辑，我们在云南当兵的人都知道一句军营老话叫“云南姑娘带不走”，但是小魏恰恰是李迪从云南带回来的一个云南姑娘，我经常开玩笑说：“这是李迪最丰厚的一笔稿酬。”

我的诗集《吃石头的鳄鱼》出版后，使我对儿童文学有了新认知，对这个事业也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直觉和判断，所以我感谢李迪，感谢我这位好编辑、好战友，他把我领入了儿童文学创作队伍，而且《朝花》不断给我提供版面，除了个人的创作之外，也让我写下了大量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研究。就这样，我用理论引导创作，用创作支撑理论，成了一个理论和创作双栖的儿童文学作家。

李迪曾经有一段时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进入了公安题材的文学创作，在公安文学领域大名鼎鼎。除了那部著名的中篇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他在最后的10年写下了一批和公安相关的报告文学，最有影响的应该是《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李迪对公安题材的执著和热爱远远超于一般的作家，我记得2009年的10月，公安部、监管局邀请一批名作家访问各地的看守所，李迪选择了丹东，我给李迪写了两首诗，第一首《赠李迪》：

八下丹东迎龙年，
今日昨日不一般。
昨日潜行看守所，
而今载誉凯凯旋。

第二首：
举国同欢庆佳节，
迪兄独向高墙歌。
一笔在手写狱警，
此心当与云天接。

李迪特别珍视自己的这次写作机会，为了写好看看守所的公安干警以及有特殊经历的犯人们，曾经有三个年头的除夕夜他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这种深入和扎实的生活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有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从《丹东看守所的故事》一炮打响之后，李迪写了个长篇小说《花自飘零》。在出席他的作品研讨会上我即兴给他写了一首诗：

花自飘零水自流，
迪兄惯写墙中愁。
情深掷笔无觅处，
窗外白云正悠悠。

《花自飘零》讲述了一个女孩子特殊的身世，李迪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下了一个北京女孩特殊的命运，非常感人，催人泪下。

这是李迪从云南回京以后的第二部作品，然后他进入了创作的喷发期，一部又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面世，一个又一个研讨会召开，我和李迪的诗缘也不断地拓展延伸。比如他有一部公安题材作品叫《黑案》，我写下了读《黑案》有感：

四目相对五番泪，
三悲两喜鬓毛衰。
白虎堂上林冲怒，
公权亟盼正义归。

后来在李迪的《英雄时代》研讨会上，我又即兴给他写了一首诗：

题《英雄时代》
逝水如波说英雄，
一代不如一代同。
惟有此款终难改，
慷慨报国意从容。

当时李迪到洛阳采访，同时采访了洛阳的一个花农，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散文。李迪移植了洛阳的花到自己家，告诉我们种植牡丹花的各种体会，于是我又写了这样一首诗《观牡丹赠李迪》：

姚黄魏紫富贵花，
移入京都迎归家。
朱门豪宅不轻统，
专为知音把根扎。



后来李迪写下了一部重要的著作《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讲述英模民警陈先岩的故事，读后我大感动，连夜给他写了一首七律：

社区民警怎炼成？
遍地鸡毛拾其中。
大爱云飞天行远，
孺子牛耕地生情。
警徽灼灼初心暖，
平安声声热泪进。
百味杂陈说往事，
“三八作家”笔力雄。

“三八作家”是带引号的，是“深入、心入、笔入”。这次研讨会上大家对李迪的作品做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最感动的应该是在被采访者陈先岩本人。他视李迪为知音，始终对李迪充满敬意。此外，还有李迪写的一部极具特色的短篇小说集《警官王快乐》，同样是社区民警的故事，但有了李迪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幽默韵味，我立即用书法写了一首诗向他表示祝贺：

百篇王快乐，
珠玉信手拈。
文采减花雨，
巧塑新警官。

这首诗也展示在李迪的《警官王快乐》研讨会上，后来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而这位“不知疲倦的行走者”已经再次踏上新的创作之路。

在李迪接受十八洞村采访任务前，我和李迪、培禹刚刚从美国旅游归来，那是一次特殊的旅行，一批战友都带着自己的妻子赴美旅游，我们还参加了洛杉矶作家协会为我们举行的一次作家座谈会，这算是我和李迪、培禹三个人最后的一次文学活动。李迪在这次聚会中绘声绘色地表演了山西永和县小贩的叫卖声，引起了美国华人作家们一片笑声。从美国归来，一周之后即2019年11月中旬，李迪以短信告诉我接受作协的扶贫采访任务，要到湘西十八洞村，于是我即兴在手机上发给他一首小诗，这就是《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序，诗是这样的：

十八个神仙十八洞村，
十八位罗汉说脱贫。
十八家故事真生动，
湘西父老谢恩人。

这是即兴写的，但是李迪居然把它作为了这本书的序。

时间飞快地过去，庚子年到来，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中国。李迪的腰突然剧痛，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腰的问题，所以他在微信上告诉我自己腰疼，“再大问题没有了，就是坐下写一会儿腰疼”。这是2020年4月29日他给我的微信，接到这个微信的时候是当天晚上的7点钟，我紧接着给他写了一首即兴打油诗，20分钟后发给他：

乐为脱贫竟折腰，
湘西烟雨走几遭。
一笔挥洒十八洞，
罗汉群像看素描。

这是一种开玩笑的朋友间的赠诗，而李迪很认真地说：“这个是不是也要放到《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序言里边？”我说：“第一首诗是开篇，第二首诗是收官。”我们在微信上貌似轻松地调侃着，但是死神已经悄悄地靠近了李迪……

两个月后，李迪离开了我们。因为疫情，我不能送李迪最后一程，悲痛之中拟了两个挽联，一个挽联是：

四十载滇军老友如兄如弟，
一生缘文坛操笔歌哭纵情。

第二个挽联是：

笔勤手勤腿勤，一为作家笑担当；
血热心热文热，三界走遍哭李迪。

2020年6月29日
李迪最后给我的一本书是《宣传队》，书的扉页上他这样写道：

洪波丹江老友：
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时向我们张望。

2020年1月14日
在李迪遗体火化的那一刻、那一夜，我无法到医院为他送行，但是我通宵把《宣传队》重读了，读的时候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可以用“悲欣交集”四个字来概括我对李迪赠予我这本书的阅读感受。

是的，诗念李迪，诗念一个远去的快乐的朋友，我相信此时他正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注视着我们，用他热情似火的心胸，用他那灼灼逼人的文笔告诉我们：“朋友，热爱生活，善待生活。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走了，我仍在！”

怀念夏衍同志

上海刚解放时，负责上海文学工作的夏衍同志非常关心上海文学事业，对上海作家协会关爱之至。他希望作协会员都有真才实学，曾亲自出题考上海作协会员，题目中有中国四大说部是什么，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什么。答卷第一名是任大霖同志。

夏衍同志后来调到北京去了。开文代会我见到他，他坐上了轮椅。

资治通鉴事

回想敌伪时期，有人带一部《资治通鉴》过日本鬼子关。日本鬼子说这人是共产党，带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司马光和马克思有一个字相同，两个字音相同，于是把这人抓起来。后来总算弄清楚不是这么回事。

这是当时《申报》登的新闻。

老友包蕾

我的老友包蕾兄实在聪明，所以写出好作品。他本来是电影编剧，我看过他好几出戏，如《珠光宝气》等。可是解放后他当了少儿社总编辑，专注儿童文学工作。

他为人非常风趣，和我们一起下乡劳动，总带着一瓶药水。到一定时候，他就要喝药水。工宣队看见他吃药，也就让他停下工作吃药。其实那玻璃瓶是药水瓶，里面装的并不是药水，而是香喷喷的上好花雕酒！

他是在广慈医院去世的，我曾到医院探望过他。他还是很乐天的。

记良友画报

解放前十分流行的《良友画报》和《体育画报》，其用纸是我父亲的华兴纸行提供的，因此纸行收到多本样书，就各寄一本到广州给我。从这两份画报我知道不少东西，特别是体育新闻，如足球名将李惠堂、李天生、陈镇球，跳高能手符保卢，长跑名人李长春等，以及许多电影明星的事。我特别崇拜胡蝶，因为她是广东鹤山人，是我的同乡。

这些画报让我知道国际国内许多大事，很有意义。我感谢这些画报，也希望今天着重出版这种画报。不过想想也不对，如今有电视，大家看电视，也不需要看这种刊物了。

我想起1938年从广东到上海，在临时开设在大新公司四楼的岭南中学读书，老师是《良友画报》原来的编辑。《良友画报》后来迁到香港还继续出版了一些日子。

记我的第一篇文学翻译作品

《黏土做的炸肉片》是我的第一篇文学翻译作品，这篇土耳其小说登在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上。我觉得它很有意义，就译出来。当时倪海曙老大哥在孔另境前辈创办的华光补习学校任教，他把译稿给孔老先生看，蒙孔老先生采用，放在他刚创刊的《新文学》杂志上，钱君匋前辈还把它放在编排得很好看的位置上。

一看就知这译名外行，内行的话，可以译作《烂泥排骨》。当时土耳其小学生家里穷，空下来在海边用烂泥做排骨玩，有一天他奶奶给了他一块真的炸排骨，他带到学校，爱不释手，上课老师以为又是烂泥排骨，把它扔到窗外去了。我很感动，因此译出。

发表这篇译作，倪老大哥和孔老前辈都是我的大贵人。我以后走上写作之路得谢谢他们！

举轻若重与举重若轻

□陆建华

1959年末，我第一次在《萌芽》正式发表作品，此后30多年的工作之余笔耕，发表了大大小小散文逾百篇，出于敝帚自珍的想法，编了个书名《不老的歌》散文集。书稿编定后，非常想请艾焯先生写序，鼓足勇气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后微笑着说：“等我看过书稿再说吧。”

一周之后，收到艾老派专人送来他的序，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拜读。打印得清清楚楚的两页纸，题为《俯拾身边事，抒发心中情》，文题下有艾焯的亲笔签名。这题目，这签名，我看了已经满心欢喜，及至读了序的开头第一节：“一本三百多页的书，竟包容了一百多篇文章，应该说这是一本薄而重的书了。”“薄而重”三字令我眼热心跳。

事后我了解到，艾老收到我的书稿后，当天就放下手上事认真读了两遍。他深知，成千上万的有志于文学创作的爱好者，绝大多数都是像我这样，在业余从“小”作品开始写作的。我的书稿不但加深了他对新时期蓬勃勃的群众性散文写作现状的判断，也唤起他就此发表看法的写作激情。当他确定为我这个无名作者的第一本其实分量很“轻”的散文集写序时，他顺势对广大业余写作爱好者做了一番情深意长、深入浅出的关于散文写作的指点与鼓励。他在序中特别就作品的大和小发表了精辟的看法。他说：“大未必就深，就重。小未必就浅，就轻……大人物大故事大场景大悲喜，那是电影和长篇小说的世界，小人物小故事小场景小幽默，这正是散文驰骋的宽广天地……”这些见解不只让人耳目一新，更让创作从“小”开始的文学爱好者深受鼓舞，增强了在文学攀登道路上前进的信心。他的严谨认真态度，让我深切体会到一位散文名家对后学者的深情爱护，其虚怀若谷的大家美德跃然纸上。

如果说，艾焯先生持严谨认真态度为我写序是举轻若重，那么，他对散文创作发表见解则是举重若轻了。中国是散文大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到今每一个时代产生的散文大家及其经典作品真是灿若星斗，艾焯先生自幼熟读古典散文精品无数，许多名作名句他是了然于胸，更由于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其反映现代生活的散文独出机杼、自成一格，其代表作《碧螺春讯》已成为人们公认的经典之作。这样的古今交融，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和谐结合，使得艾焯先生谈见解时箴言妙语，源源涌出；举例时随口道来，妙语如珠：“散文和诗都重情。诗可离叙事而抒情，散文常藏情于叙事中……不是只有经纬天地，正襟危坐，才会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东坡先生和公安三袁的性之所至，常会发而为妙文。此正我辈后学者，步前尘履之着力所在。”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绝非纸上谈兵。他写序时的用心和精心，还可以从遣词造句上看得出来，序不长，但字字句句都经过推敲，对仗工整，声律和谐，堪称是诗情勃发的美文，不只读了受益，诵之还能享受阅读的美趣。

艾焯先生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故在序中有意就机关干部特别是文艺官员的业余文艺写作谈了看法，这些看法如他谈散文写作同样精辟深刻，甚至格外发人深省。他先是幽默地比较了作家与官员的异同，并由此生发开去，说：“这是两类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业务。两者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操作方法也不一样。不能把官员生活的规范化模式化，引进文学创作中；也不能把艺术家充分发挥个性、率意随笔的作风引进工作中。二者不可相互替代”。他还强调，“同样是文章，但在题材的选择、定向、文章的取意，结构，语言的或灵巧或庄重的运用（包括字词组合，句式，语法）等等方面，即使没有相距十万里，也是楚河汉界，鸿沟明明白白！……在作家当中，常常有身跨两界的超人。只要区分清楚了，一个人确是可以几支笔，写出几种不同文章来的。但就怕一支笔在墨水瓶，和黑墨汁混中混蘸混同！”这是叮嘱我，更是对更多“官员作家”们的殷切期望。

接到艾焯先生写的序，当时打电话给他表示谢意，并说，“您为我写了这样精彩的序，我已感谢不尽了，应该让我找人打印才对，怎么还麻烦您老人家亲自安排？”没想到，艾老听了哈哈大笑，他说：“什么麻烦不麻烦？我自己电脑写，电脑打印，方便得很呢。”听我说不会使用电脑，觉得电脑写作很难，他爽朗地批评说：“我已70多岁了，你才多大年纪？快去学电脑，要真正做到全面与时俱进啊……”

三言两语
□任溶溶